

中共十四大、基本法與一國兩制的生存空間

何廣才*

舉世矚目的中共十四大，經已曲終人散。中、港、台、澳乃至世界各地華人，如何評價這次會議？真可謂莫衷一是，但從眾說紛紜的煲水新聞中，有一點却是肯定的，即以鄧小平構想為主導的十四大政治路綫和新一屆中共領導層的人事安排，不僅對本世紀的中國大陸，而且對台、港、澳未來發展前景，均具極深遠的影響。儘管這種影響仍然潛伏着不少未知的變數，但人們却不能忽視作為龐然大物的中國，尤其不能忽視駕御這一龐然大物的中共。這就是擺在世人面前的、不可迴避的歷史與現實。也許中國人可從坎坷和痛苦的往昔中，尋出一條可行的新路，一條沒有太多主義和色彩的新路，一條和諧、富裕、充滿仁愛的新路。如果是這樣，那是我們這個久歷滄桑的古老民族的莫大幸運。然而，問蒼茫大地，誰是我們寄望之所在？朦朧中，不少人曾把歷史的聚焦鏡折向秋日的北京，靜候那新思維的閃現……。

鄧小平構想的特色——兩手抓

新思維是有了，那是鄧公構想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特色，簡言之就是兩手抓：一手抓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手抓無產階級專政。中共總書記江澤民在十四大所作的政治報告中，開宗明義地指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黨的基本路綫。其目標是尋求從根本上改變束縛我國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並聲明它不是原有經濟體制的細枝末節的修補，而是經濟體制的根本變革，變革的核心是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共統治大

* 中學教師

陸四十多年來，第一次從頑固的斯大林經濟模式（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窖室中跳將出來，這是對數十年來中共以及世界各共產國家經濟失敗的慘痛教訓的撥亂反正。是正視客觀經濟規律的結果。不管中共如何去闡釋這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然而國人對這種改變明顯地表示了歡迎。正是這個市場經濟的無形推動，才令十多年來本已積重難返的大陸經濟踏上了新台階。肯定地，隨着市場經濟進一步拓展，中國大陸以致整個中華經濟圈，將會出現一線曙光。而經濟的改善又必然對意識形態產生浸潤作用，隨着新一代的成長我們有理由相信，一種美好的社會模式將會逐漸確立，並被人們所接受。能否產生這一連串的正面效應，恐怕人們仍將拭目以待。雖然這個由中共最高權威鄧小平倡導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並不是什麼新東西（刻薄者謂之為掛羊頭賣狗肉），但以中共國情之嚴峻、左傾思潮之濃烈，要跨出這一步，除了要有尊重客觀事實的魄力之外，還需極大勇氣和權威。“六四”之後的鄧小平，在風燭殘年之中總算下翻一着好棋。但人們不可忘記，在鄧小平的錦囊中還有另一手，就是必須確保社會主義政治穩定不動搖，這在江澤民的政治報告中更是言之鑿鑿擲地有聲。“四個堅持”被奉為立國之本，聲明不搞西方的多黨制和議會制，在國家機構實行民主集中制，在社會控制上則強化人民民主專政的職能，堅持了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的鄧小平構想的實質。這就是經濟上防左，政治上反右的基本路綫，中共今後的內外事務對策，均會源於這一脈絡。

一黨專政與腐化效應

中共統治大陸四十多年的政治特色是一黨專政，黨的領導高於一切，且不容挑戰。黨的無上權威不僅體現在一個作為集體形態的黨組織上，而且更集中地體現在作為個別形態的黨的領袖身上。不容挑戰的權威，設有制衡的體制，集黨、政、軍以及經濟大權於一身的共產黨人，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史歷罕見的腐化效應。各種防不勝防的盲目和腐敗屢見不鮮：整風、反右、三面紅旗、四清、反革、官倒、六四……從未間斷。這些慘痛教訓，是不可一吹了之的，人們是需要向前看，然而歷史已在心靈中打上了烙印，除了極需時日沖洗之外，更需執政的共產黨人，用實際行動，給人民以信心。

十一屆三中全會，中共雖然放棄階級鬥爭為綱的極左路綫，這無疑是歷史的轉折，但直至現在，真正的民主機制尚未建立，而所謂“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祇是徒具虛名。人民所樂見的，不是紅頭文件的革命化口號，也不是宣傳機器的華章艷藻，那些“花瓶黨”，橡皮圖章不僅毫無新意，而且早已令人厭倦。一個清醒、務實、具有量度和真正為國家的政黨，是會受到人民擁戴的，她根本不需要什麼強化黨的領導，更不需要無上的、不受挑戰的權威。江澤民總書記在十四大報告中，雖然提到積極推行政治體制改革，使社會主義的民主和法制建設有較大發展，但給人的感覺却是那樣抽象、空泛和毫無新意。積四十年經驗，證實這完全沒有實質的制衡作用。人們不理解，一個擁有五千萬黨員的大黨，一個集國家所有權力於一身的大黨，為什麼不能以更寬宏的量度面對國民。所謂“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這是歷史規律，中國共產黨人也絕不能外在

於這一客觀規律。即使是中共最高權威，當年的毛澤東、現今的鄧小平也不能迴避這一事實。可是，在江總書記的報告中，人們不難地感受到，這種強化黨領導的呼聲，躍然紙上。這使人們自然地聯想起六、七十年代所鼓吹的黨的一元化領導以及強化無產階級專政的影子。新中國建政數十年間，政治高調的出現往往是災難將至的先聲，這就是為什麼國人總有身立危牆和心有餘悸之感。如果中共掌權者能跳出這種頑固的政治樊籠，創造一種民主、和諧的氣氛，建立一套有效的監督機制，切實查處各種以權謀私、無視法紀、貪污舞弊的腐敗勾當，這樣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才能正常發展，腐敗效應方可制約。

後鄧小平時代的台、港、澳對策 與一國兩制的生存空間

隨着十四大帷幕的落下，一中全會誕生了新的領導集體，雖然這是在極不民主的中共傳統選舉方式（等額 + 舉手）下產生，但多位政治老人的退出台前，標誌着後鄧小平時代，政權結構的新轉機。這對中共政局以及台、港、澳未來政治發展不無影響。馬克思主義學說中的否定，否定之否定現象也許隱伏在這種轉機中。不過人們心中十分明白，祇要政治老人仍坐鎮中南海，鄧小平的“兩手抓”不僅在中國大陸成爲主流，而且必將延伸到中共構想中的台、港、澳特區，“一國兩制”也祇能在這個空間下生存。

“一國兩制”究竟是出於鄧小平的“恩賜式”，還是“誘惑式”的設計，筆者以爲可以不必多論。但作爲“一國兩制”未來藍圖和法典的“基本法”，明顯地源自“兩手抓”的構思。以澳門基本法而論，全文九章，其總體精神是：“政治上一國，經濟上兩制”。

所謂政治上一國者，即澳門特區的政治命脈操縱在社會主義的中共中央手中。不僅特別行政區的外交、防務、長官任命均由中央直轄，而且主要行政長官、立法議員、行政委員、法官、檢察官就職必須宣誓效忠中央。在緊急狀態時，中央政府可發佈命令將有關全國性法律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實施。基本法第二章第二十三條載明：澳門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爲，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澳門特別行政區進行政治活動，禁止澳門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這些沒有訂明細則的條文對澳門居民的政治言論和政治活動將造成極大陰影和威脅，對早已成爲國際都會的澳門的發展也極爲不利。在政制方面，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長官和立法會司法機關產生辦法，均體現了由中央主導的精神。第一屆政府、立法會和司法機關產生，是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設立的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負責籌組。籌備委員會由內地委員和不少於半數的澳門委員組成，主任委員和委員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委任。而第一屆行政長官由推選委員會在當地通過協商或協商後提名選舉的方式產生，再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可以說一切由中央主宰，澳門的平民百姓一概被剝奪了選舉的權利。還有，基本法的解釋權屬全國人大常委，修改權屬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這樣，所謂高度

自治，澳門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是如何體現呢？特區的整體政治均由社會主義的中央主宰，而資本主義的政黨政治和自由選舉制度却摒於局外，即是說資本主義的政治實質已被抽空。這就是香港彭定康的施政報告何以受到中共如此猛烈評擊的實質所在。 “兩手抓”， “兩手都要硬”， 在“一國兩制”中有了充份體現，其實縱觀中共幾十年政蹟，政治一手從來都是最硬的。

澳門基本法有關經濟、文化和生活部份的條文，基本可以體現兩制的特質。正所謂馬照跑、舞照跳、賭照開、財照發、澳門人這點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大可高枕無憂。其實內地何嘗不是朝着這個方向變化。

簡言之，“一國兩制”的生存空間是與中國大陸的政治氣候息息相關。就目前情況看，政治層面的自由生存空間是十分狹小的，彭定康爆炸效應就是先例。而經濟層面的生存空間却大有發展餘地，但你也必須要照顧到特區政府的未來錢袋。